

后危机时代20国集团主导权之争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同一天，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在华盛顿上演。这两大事件的同时发生，也许不仅仅只是巧合。发达国家内心深处对G20所持的乃是一种功利和投机的态度，即只有当解决它们自身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才需要“平等”对话，以换取新兴大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期待的“国际政策协调”中来；而一旦危机结束，发达国家仍希望世界回归的国际经济格局中。由于共同忧患的消散，G20即便今后继续存在，也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发达国家为主的G8集团，另一方则是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由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阵营。

刘涛

4月14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及南非五国领导人齐聚海南三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就在同一天，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在华盛顿上演。这两大事件的同时发生，也许不仅仅只是巧合。

众所周知，作为G20首脑峰会的先行磋商会议，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于今年年底在法国巴黎召开的G20首脑峰会具有指针意义。根据以往几次G20峰会的传统，东道国总能凭借地利之便，在议题设定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

20国集团仍由西方把持

回顾G20峰会诞生以来所走过的路，可以发现，它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前后两个阶段：

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召开之际，正值金融海啸疯狂肆虐。在一片哀鸿中，

直言不讳 | Call a Spade a Spade |

破解民间高利贷风险 还需疏堵结合

蒋悦音

随着我国不断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出台，防范民间金融风险集中释放逐渐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最新的权威监测数据显示，中国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在2010年民间金融活动异常活跃，且呈现规模明显扩张、参与主体更加广泛、借贷用途更加隐蔽的特点，一些融资性中介机构通过组织个人贷款资金或储蓄存款从事高利贷活动，借贷月利率高达三四分，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有所抬头。2010年仅温州市因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及诈骗就立案20起、涉案金额9.92亿元，平均涉案金额4955万元，比2009年翻了一倍。

笔者以为，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地下金融”在我国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进程过慢而导致的一种独特现象，且目前这些地下金融涉及金额数量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不能“一刀切”进行全盘否认，对其中的合理部分加以引导和规范，使之由“灰色”向透明发展，才是多赢的有效举措。

民间信贷的“灰色”，除了“灰”在身份和渠道，主要聚焦点还在于利率

各国民众迫切希望看到有英雄站出来拯救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而各国领导人也不急于坐在一起相互打气、抱团取暖。可以说，G20峰会正是在这样仓惶的气氛下匆忙起航的。事实证明，它最终担负起了全世界的重托和希望，各国团结在G20的旗帜下，共同实施扩张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在此后的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相对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令世人仿佛看到了未来一个崭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此时，G20的声誉已达到鼎盛，大有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全球治理核心之势。

然而，随着危机阴霾的逐渐散去，当各国先后踏上了复苏进程，自2010年多伦多峰会开始，事情忽然起了微妙的变化：美国不再把“同舟共济”四个字挂在嘴边，而是在会前就对人民币升值公然施压。等到了首尔峰会，美国和中国更是双双卷入了所谓的“货币战”漩涡。

2010年底，法国接任G20轮值主席国之初，便立即宣布了其关注的三个重点目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规范原材料市场和全球治理改革。其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摆在最突出位置。此后，法国多次表明，它特别重视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

表面上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各方都赞同的主张。但大家说的真是一回事吗？在萨科奇和盖特纳口中，它首先是“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而在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眼里，它更应当是挑战美元霸权，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然而，由于在议题主导方面的垄断，在美欧导演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在G20议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被关注”，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反而堂而皇之地坐在裁判席上。

G20的命运伴随着危机浮沉起落，这一幕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美国那位传奇将军乔治·巴顿，人们对她一生最形象的总结就是，“他是为战争而生的；当战争结束时，这个世界也就不需要他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发达国家内心深处对G20所持的乃是一种功利和投机的态度，即只有当解决它们自身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才需要“平等”对话，以换取新兴大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期待的“国际政策协调”中来；而一旦危机结束，发达国家仍希望世界回归的国际经济格局中。

金砖国家需要整合力量

但对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回到过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场危机早已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

不可否认，美欧在G20峰会上也曾经做出过一定让步，例如，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同意对世界银行、IMF等机构的份额和投票

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包含利率本数）的均可算做高利贷。而在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民间借贷利率都是远超这个的，也就是说高利贷成了收编民间金融的最大障碍，但也就是因为高利率，才是民间借贷生生不息的源动力所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数据就显示，温州民间金融借贷规模不仅已经突破600亿元，而且这些民间借贷的利率，最低也高于银行利率4倍以上，相当部分甚至是银行利率的10倍以上。由于违法，一些民间高利率借贷纠纷不可能通过正常法律渠道获得圆满解决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提高了高利贷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关联性。解决好民间借贷的合法化问题，对于降低此类案件的发生基数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在融资所占比重中亦呈现出上升趋势。以温州地区为例，根据银监部门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在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已经达到54:18:28，也就是说，民间融资比例已经超过银行贷款。

对于现实存在且供需活跃的民间融资市场，有疏有堵、并以合法透明化为主线模式，才是缓解“高利贷”洪流并抑制其中灰色事件频发的必然之选。

既要城市化又要避免贫民窟

廖保平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东盟城市交流与合作”研讨会上，从马来西亚前来中国取经的代表们对中国的城市面貌羡慕不已，他们通过翻译不停地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为什么你们的城市这么干净？为什么你们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

面对友邦的惊诧，李铁回答的是：作为政府的考虑，不希望在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出现像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所以你们看到，在中国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原因是我们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当然这种限制政策也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李铁的回答可以用“真诚”二字来形容，不隐不讳，不知友邦有没有再度惊诧。因为，既然是限制，就包括没有进来

的不让进来，或是有条件地进来，以及进来了的搭建起贫民窟会被清理掉。

关于城市化与贫民窟的问题，争论已久。美国知名学者麦克·戴维斯曾写了一本书叫《贫民窟星球》，他认为，第三世界里不受控制的城市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第三世界的城市化并未与工业化同步，所以他建议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必须审慎对待。与这种理论相反的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瑟在他的《城市的胜利》一书里认为，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城市化，只有城市才能实现更高效率的生产，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城市贫民窟非但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城市具有活力的表现，是乡村向城市化进化的跳板。

就李铁的回答和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我们赞同或运用了第一种理论，搞“进城准入”，农村人口，

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大为提高，也就大大减少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但是限制的背后必然是以牺牲某些权利为代价的。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就是以限制农村人口入城为手段，代价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丧失自由迁徙的权利和其他福利。具体而言，就是难以获得城市户口，也就难以平等地享受捆绑在城市户口上的种种城市福利，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城市公共服务。

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光鲜的背后是以一部分国民牺牲权利为代价的，是农民的巨大付出，成就了城市的光鲜。

进行调整，但这种极为有限的让步，事实上远不足以动摇美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在不久前结束的G20南京研讨会上也有体现：面对一些代表提出将人民币等新兴经济体货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以增强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建议，美国一方面表示支持改变SDR一篮子货币的构成，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加入SDR的国家必须满足弹性汇率、独立央行及资本自由流动等条件。

从金融危机结束后的趋势来看，由于共同忧患的消散，G20即便今后继续存在，也将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发达国家为主的G8集团，另一方则是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由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阵营。

对于中国而言，若不及早加以阻止，G20有朝向G8靠拢的趋势，它有可能沦为被美欧操纵的又一个国际机制。从包括今年巴黎峰会在内的6次G20峰会的主办权来看，除首尔峰会勉强可以算在发达国家之外举办外，其余几次基本上都是在美欧轮流坐庄。

因此，必须趁着G20还没有完全“变质”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应充分利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样的平台协调立场、整合力量，并积极联合美欧之外的更多国家一道发挥影响力，将G20的重心回归到美欧金融体系的监管，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让G20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某种程度上说，此次南非作为新鲜血液加入金砖国家阵营，表明新兴大国已在这场大博弈中先占一着。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

焦点评论



动车实行实名制

实名购买火车票，黄牛沮丧旅客笑。路费不能涨太快，运力还需提更高。垄断经营生弊病，霸王服务惹牢骚。改良若不动体制，按下葫芦浮起瓢。

唐志顺/画 孙勇/诗

没有中国现在的发展局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城市受益，农民也受益，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鼓励、保护而不是限制人口流动。

但是，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道路，也不应该成为“光荣的榜样”，中国又要城市化，又要避免或减少贫民窟，出路在哪里？我觉得学者周天勇提出的一些思路值得思考，比如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实现农民手里的农村资产退出变现，使农民拥有进城的创业资本；为贫困人口提供廉租房。这样，就可从总体上实现农民的体面进城，避免城市化陷阱。

我认为，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农村资产退出变现要解决好产权问题，使农民手里的土地财产化，平等入市，否则，将是对农民权利的又一次剥夺，那么，他们不但不能进城，而且连在农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也保不住。

胡说一道 | Hu Bugui's Column |

今天你调研了吗



胡不归

近日遇到一位做私募的朋友，问他：“怎么好久不见你了？”答曰：“忙啊，刚去一家上市公司调研回来。”我说：“我咋不知道你还会做学问呢？看得懂财务报表吗？”他只是笑，对我的戏谑问题不予回答。

其实，即使他笑而不语，咱俩心里也都明白，他们所谓的调研，不过是去上市公司打探消息而已。做私募的这几个朋友，与一些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跟不少公司董秘都称兄道弟，经常去走动走动，联络联络感情，顺便打探点儿公司方面的消息，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调研是不用写什么调研报告的，所以也无所谓能否看懂财务报表的问题了。一些大型机构如基金，赴上市公司调研，那肯定是要拿出东西来的，至于那调研成果，当然就属于机密了，一般股民想知道详情，恐怕门也没有。

去上市公司调研，现在已经成了机构尤其是基金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它构成了基金重大投资决策的一个基础。但我纳闷的是，不是有公司信息披露吗？并且，每逢年报季报等信息予以披露时，都要郑重声明：“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保证责任。”看，人家已经信誓旦旦了——真实、准确、完整。但是，既然如此，那干吗还要去实地做调研？就凭这些公开信息不就够了？

我注意到，上市公司的承诺里，还缺少一条“及时性”。也许，基金等机构非要花费人力财力去趟公司不可，就是冲着这一点去的吧。公司的一些酝酿中的重大变故，如重组、巨额订单等，还没到法定的必须披露的时机，基金等机构就可以通过调研，先人一步，然后静悄悄地埋伏在股票里面了。等到小股民知道这些利好消息，蜂拥而入时，股票已经翻了几个跟头，其结果无异是，普通投资者又一次成为高位接盘者。时间就是金钱，这话一点没错。这也是调研的效果吧。

我们不止一次地听说，某某明星基金经理又一次押对了宝，他买的股票经过几个月的等待，果然宣布重组了。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基金经理与神仙无异，否则，为什么总是赌公司重组能赌对呢？其实，哪是什么赌重组啊，本来就要重组！不过你小股民不知道罢了。照我看来，“明星”们不过是“调研”工作做得好而已，世上哪有什么神仙？

大鳄们总能先知先觉，但是，如果仅仅把机构调研看做是为了打这个时间差，恐怕就太单纯了。调研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多的秘密。

我们对机构赴上市公司调研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同是调研，大机构、小机构、大股东、小股东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上市公司对于股东咨询或者造访，法规上是有相关条款的，譬如投资者关系，该怎么对待怎么对待，自不待言。但据我所知，这里面还是大有文章。小股东想了解公司的事务，电话也是可以打得通的，并且对方的态度也可能是热情的，甚至有时候，小股东们还会接到盛情邀请，去参加一些诸如“走进上市公司”之类的活动，去参观参观公司生产线，欣赏欣赏厂环境啥的，还能聆听一下公司方面“生产经营形势一派大好”之类的宣讲，从而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股东的身份。感觉固然不错，但你能得到的信息，绝对不会超出已经公开的信息范围。机构所受到的待遇则不同，他们和公司之间，已经从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关系上升到一种合作关系了。这种合作，往往是在公司将要进行再融资的时候。这种时候，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大机构，更成了公司方面高贵的座上宾。道理很简单啊，没有资金拉抬二级市场的股价，那么高的配股价格或者增发价格，怎么会有人来捧场呢？而这种合作背后是怎样的一种利益格局，笔者无凭无据，也不敢瞎猜。

所以，即使是机构，所受到的待遇也会是不同的。曾听说过这样一些案例，一些小机构赴公司调研不怎么受待见（像我前述那位私募朋友属于另外一种情形），而却有上市公司找到大基金公司的门上，哭着喊着“来我们公司调研吧”。这么急切的心情，恐怕不是要主动找人来窥探自己的隐私，而是另有所图吧？这种调研，与其说是调查研究，倒不如说是合谋在证券市场上整点儿啥事更准确。

这才是调研名目下的另外一个公开的秘密呢。

信息不对称，是股市上一个难解的痛。什么时候，在调研这个问题上，所有的投资者能够站在同样资格和水平上呢？笔者的一位做期货的朋友，倒是真正进行过个人调研。为了判断咖啡的价格趋势，他老兄自费跑到海南去，找当地种咖啡的农民攀谈，了解当年咖啡的种植情况，依此作为自己的投资依据。可是，对于大多数散户来说，有几个有这样的精力和财力去做这样的调研呢？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第一时间”——也就是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的当天，股市开市前的那段时间里，去阅读公告罢了。殊不知，那公告发布之后，其内容不知道被多少市场大腕早就“调研”去了。不信的话，你随便找个有重大利好信息公布的股票，看看它在公告之前的K线图试试。如果你觉得这种调研毫无意义的话，那也就只好去探消息跟风了。这正构成中国股市一幅活生生的生态图。

既然普通投资者不可能像机构大佬一样亲赴企业去调研，那么，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对于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还有“及时性”，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必要亲赴企业调研吗？即使还会去调研，那种调研的意义，和现实中那种明显的做一把就跑的功利目的，也会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我不知道巴菲特做出投资决策前，是不是也要像我们的机构一样去做这样的调研。也许，中国的这种调研特色消失的时候，才是中国证券市场真正开始成熟之时。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